

台灣民衆之性格與行爲的變遷

楊國樞*

目前，世界各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與速度進行現代化的歷程。在這一歷程中，現代化所涉及的主要是兩個層次，即社會的層次與個人的層次，前者稱爲社會現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後者稱爲個人現代化（individual modernization）。以社會變遷的形式所表現的社會現代化，會在社會層次造成種種新的特徵，這些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職業及家庭等方面的特徵，可以總稱爲社會現代性（societal modernity）。現代性的生活環境會導致個人現代化的歷程，後者在個人層次所形成的種種新特徵，則可稱爲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在此整個歷程中，社會現代化所涉及的是社會變遷，個人現代化所涉及的是個人變遷，而性格蛻化與價值變遷則是屬於後者的範疇。一般而論，尤其是在現代化的早期，社會現代化常是在前而爲因，個人現代化常是在後而爲果。但在正常的現代化歷程中，社會現代化與個人現代化常能互相影響，形成良性之互動而進的連續歷程。

台灣地區的社會現代化歷程雖然爲時已久，但變遷最快的時期則爲最近的二十幾年。從以往發表的有關資料（如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83）可知，在過去二十幾年內，台灣地區在很多方面都有大幅的成長。例如，自 1964 年到 1982 年，在經濟發展方面，GNP 成長約 18 倍，國民所得成長約 12 倍；在教育提高方面，受高等教育者所佔百分比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成長約 3.5 倍，受中等教育者所佔百分比成長約 2.6 倍；在職業結構方面，非農業（工商與服務業等）人口所佔百分比成長約 19.7%（從 53.9% 到 73.6%）；在大眾傳播方面，出版單位成長約 3 倍，期刊雜誌總成長亦約 3 倍，電視與報紙之機構數雖無成長（政府政策使然），但收視人數與閱讀人數則皆有大幅增加。在最後二十多年來，台灣地區在各方面快速成長所顯示的社會變遷，應能對民衆的心理性格與價值觀念產生相當的影響。本文的目的即在根據過去的實徵研究，就台灣之社會變遷所導致的性格蛻變與價值變遷，作一個系統性的說明與討論，以獲知在現代化過程中台灣的中國人在心理與行為上轉化的大致方向。

過去二十年來，已有為數不少的實徵研究，是以此間民衆之心理與行為的變遷為主要的探討課題。就其所採用的研究策略而言，此等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中一類是採用貫時性的方法（*diachronic approach*），另一類則採用同時性的方法（*synchronic approach*）。在前一類研究中，尚無採取重測樣本設計（*panel design*）者，因運用此種研究設計，較難獲得夠大的樣本，而且不易將社會變遷效果與個體發展效果加以劃分。所以，過去的貫時性研究大都改採以下的方式：以相同的心理測量工具先後施測兩個以上的樣本，各樣本在性別、年齡及其他人口變項（*demographical variable*）上的組成儘量相近，而且各樣本間所間隔的年數須夠久夠長，以使社會變遷的效果得以顯現。

多數的有關研究是以同時性或橫斷性的方法完成。不同的研究採用不同的橫斷變項（*cross-sectional variable*）來代表社會現代化的不同程度。其中，有的研究（如文崇一，1979）採用不同的社區來代表不同程度的社會現代化，有的研究（如 Abbott，1970）則採用不同的世代（如父代與子代）來代表不同程度的社會現代化，更有的研究（如楊國樞、瞿海源，1974）則採用個人現代化程度來代表社會現代化程度。採取第三種橫斷變項的研究為數較多，且皆係以個人現代性的高低來代表個人現代化的程度。為了測量個人現代性以利此類研究的從事，楊國樞與瞿海源（楊國樞，1981；楊國樞、瞿海源，1974；瞿海源，1971；瞿海源、楊國樞，1972）特先後編製兩套標準化的「中國人個人現代性量表」（簡稱「個人現代性量表」）。目前常用的是第二套量表，其中包含五十個 Likert 式的題目，每個題目皆附有一評定尺度（*rating scale*），用以標示對該題內容贊成或不贊成的程度。題目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包括家

庭、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經濟及性行爲等方面。楊氏等將個人現代性視爲一種主要的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從而探討與之相關的性格特質與行爲特徵。實徵研究所發現之個人現代性 (代表個人現代化程度) 與性格或行爲的關係，可以做爲推論社會現代性 (代表社會現代化程度) 與性格或行爲之關係的基礎。換言之，如果個人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直接或間接效果，則可從前者與有關性格及後果行爲的關係推知後者對性格及行爲的影響。最近的實徵研究 (楊國樞、黃曬莉，1984；雷霆、楊國樞，1984) 顯示：個人現代性與性格行爲的關係與社會現代化與性格行爲的關係間，確實具有一種線性對應性 (*linear correspondence*)。換言之，在據以推知社會現代化對性格與行爲的影響時，個人現代性與性格行爲的關係具有相當的關係效度 (*relational validity*)。

到目前爲止，採取貫時性或同時性方法探討台灣民衆之性格與行爲變遷的研究，已有二十多項。特分就以下各類心理與行爲的變遷加以說明與討論，以瞭解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衆之心理蛻變的情形：(1)動機與需求的變遷，(2)價值與態度的變遷，(3)氣質特性的變遷，及(4)心理健康的變遷。

一、動機與需求的變遷

動機方面的性格特質，決定一個人所做的行爲爲何及從事該行爲時努力程度的大小。Guilford(1959)認爲動機特質包含需求或需要 (*need*)、興趣 (*interest*) 及態度 (*attitude*)。過去的有關研究未曾探討興趣的變遷，故此處略而不論。以下將先行論述有關需求變遷的研究，至於有關態度變遷的研究，則將在下節中與價值觀念或取向的變遷一併說明。

過去所發表有關需求變遷的研究，有採同時性方法者，亦有採貫時性方法者。採取前類方法的研究，大都爲楊國樞及其同事所從事，且皆係運用個人現代性的個別差異作爲橫斷變項。在其中一項研究中，瞿海源與楊國樞 (1972) 以個人現代性量表與中譯之艾氏個人偏好測驗 (*Edwards Personal Preference Schedule*) 施測 150 位大學青年，發現個人現代性與自主需要 (*need for autonomy*)、異性戀需要 (*need for heterosexuality*) 兩者成正相關，而與順服需要 (*need for deference*)、謙卑需要 (*need for abasement*) 成負相關。在另一項研究中，黃光國、楊國樞 (1972) 以個人現代性

量表與中譯之馬康二氏社會期許量表 (Marlowe - 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施測 247 位大學生，發現個人現代性與社會贊許需要 (need for social approval) 成負相關。再一項研究是楊國樞與梁望惠 (Yang and Liang, 1973) 所從事，他們以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的投射技術測量 69 位高中男生的成就動機或需要 (need for achievement)，發現此一需要與個人現代性成正相關。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個人現代性與社會取向的成就需要成負相關，而與個人取向的成就需要成正相關。

楊國樞 (Yang, 1976) 亦曾以個人現代性量表施測 322 位城市與鄉村的成年人 (161 對夫婦)，以探討個人現代化程度與幾項傳統性需要的關係。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個人現代性與下列各項需要成負相關：(1) 藉生男孩以保持與提升在家庭中之身份或地位的需要，(2) 藉生女孩以保持與提升在家庭中之身份或地位的需要，(3) 丈夫因未生男孩而減低對妻子之感情的傾向，(4) 妻子因未生男孩而害怕失去丈夫之感情的程度。此項研究亦發現：個人現代性較高者，其實有子女數、理想子女數皆較小，為控制生育所做之避孕行為則較多。

另一項以成人為對象的有關研究亦為楊國樞 (1984) 所從事。他在探討現代性員工與傳統性員工 (以個人現代性量表的得分加以界定) 之各項組織動機與行為的差異時，發現前者的工作士氣高於後者。更確切的說，與傳統性員工相比，現代性員工的工作動機與機構認同較高，離職傾向與工作厭倦則較低。除了機構認同一項外，在其他三項工作士氣變項上，兩類員工的差異皆不受性別、職業及年資的影響。

以上的研究皆係探討個人現代性與各種需要及動機的關係，是屬於有關動機與需求變遷的同時性或橫斷性研究。有關動機變遷之更直接的實徵發現，係來自黃堅厚 (Hwang, 1976) 的貫時性研究。1963 年，黃氏曾以中譯之艾氏個人偏好測驗施測國立師範大學的 660 位大學生。十數年後 (1975)，黃氏復以同一測驗施測同一學校的 269 位大學生。將兩次施測所得的資料加以比較後，發現兩個年代的大學生在多項心理需要上互有差異。扼要而言，自 1963 年到 1975 年，表露需要 (need for exhibition)、內省需要 (need for intraception)、自主需要及異性戀需要四者有增強的趨勢，秩序需要 (need for order)、撫助需要 (need for nurturance)、持久需要 (need for endurance) 及順服需要四者則有減弱的趨勢。此處有關自主需要與異性戀

需要漸強及順服需要漸弱的發現，與上文所述瞿海源、楊國樞(1972)二氏以個人現代性量表所獲得的橫斷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敘述了探討動機與需要之變遷的主要實徵研究。綜合而言，隨着社會變遷的進展，台灣民衆在以下心理需要或動機上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表露需要、自主需要、內省需要、異性戀需要、自我取向成就需要及工作動機或士氣；在以下心理需要或動機上有逐漸減低的趨勢：順服需要、秩序需要、謙卑需要、撫助需要、持久需要、社會贊許需要、社會取向成就需要、及以傳統方式獲取身份與感情的需要。換言之，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他們變得更關心自我表現、自我肯定、獨立自主及個人成就，更能從自我壓抑中解脫出來，而且對與異性相處更有興趣。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下列事項的興趣則逐漸減弱：服從社會習俗、追求秩序與組織、責怪與輕視自我、幫助與同情他人、堅忍持久不成不休、自他人或社會獲得贊許、為他人或社會追求成就。

二、價值與態度的變遷

價值 (value) 亦為一種動機性的心理特質，其性質較態度 (attitude) 更具一般性。態度是指個人對特定人、事或物所持有的一套看法 (或信念)、感情 (或情緒) 及行爲傾向 (或意向)。價值的範圍較廣，是指一類 (或組) 態度所含有的共同核心成份，此種成份涉及好壞、善惡或優劣的判斷，故能主導有關人、事、物或目標的選擇行爲。個人不同層次之各種價值的組合，即形成其價值系統 (value system)。

價值系統中的最高層次是價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依據 Kluckhohn 與 Strodtbeck (1961) 的定義，價值取向是一種複雜而有組織的評價原則，由認知的、感情的及導向的三類元素交互配合而成。價值取向對行爲有引導作為，足以影響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方向。在社會變遷的歷程中，台灣民衆在價值取向方面的變遷如何？在這一方面已從事過兩項研究，一為以大學生為對象，一為以工業區附近的農民為對象。到目前為止，只有前者已經發表。在此項研究中，楊國樞與張分磊 (1982) 曾施測 104 位大學生，所用工具除個人現代性量表外，另有依 Kluckhohn 與 Strodtbeck 原問卷所編製的選擇式價值取向量表 (共為 44 題)。所得的資料顯示：(1) 在活動方式方面，個人現代性得分較高者，其實行取向 (偏好能導致成就的活動) 較大，其內修取向

(偏好能使自我的各方面發展成統合之整體的活動)則較小；(2)在人際關係方面，個人現代性得分較高者，其個人取向(強調個人自主性)較大，其集體取向(強調團體中的上下關係)則較小。在此之前，劉君蕪、陳竹華、陳月喜及楊國樞(1973)所從事的有關研究，亦發現集體取向漸減的現象：個人現代性得分較高者，遭遇困難或問題時求教於父母的傾向較小，而求教於朋友的傾向則較大。

最近，楊國樞與黃囁莉(1984)曾同時以貫時性方法與同時性方法探討社會變遷對價值觀念的影響。他們在1984年以個人現代性量表與Morris(1956)的生活方式問卷(Ways to Live Questionnaire)施測969位大學生，其樣本組成在性別、年齡及其他人口變項等方面，與楊國樞(1972)在1964年用後項工具所施測的787位大學生大致相似。在貫時性的資料分析中，他們比較1964與1984年(相隔20年)所測的兩組大學生在人生觀上的差異，發現在十三種生活方式中1984年的大學生在下列生活方式上喜好程度較低：第一種(保存人類最好的成就)、第三種(對他人表示同情的關懷)、第五種(藉參加團體活動來實踐與享受人生)、第六種(經常掌握變動不居的環境)、第十種(堅忍的控制着自我)、第十一種(靜觀自己內心的生活)及第十二種(從事冒險性活動)；在下列生活方式上喜好程度較高：第四種(輪流體驗歡樂與孤獨)、第七種(將行動、享樂及沉思加以統合)、第八種(在無憂而衛生的享受中生活)及第九種(在安靜的接納中等待)。另一方面，經由同時性的分析，他們發現：1984年的資料中，中個人現代性與第一、三、五、十、十一、十二及十三等七種生活方式的喜好程度成負相關，而與第四、七兩種方式的喜歡程度成正相關。比較貫時性與同時性分析的結果，他們發現：除第十三種生活方式(服從宇宙的旨意)外，凡是個人現代性與某一特定生活方式喜好程度成正相關，則1984年大學生對該方式的喜好程度必大於1964年大學生對該方式的喜好程度；凡是個人現代性與某一特定生活方式喜好程度成負相關，則1984年大學生對該方式的喜好程度必小於1964年大學生對該方式的喜好程度。在這一意義上，可說貫時性資料證實個人現代性具有推測心理與行為變遷(至少是變遷的方向)的效用：如個人現代性與某項心理或行為特質成正相關，則可推測在社會變遷的時間序列中此項心理或行為係逐漸增強；如個人現代性與某項心理或行為特質成負相關，則可推測在社會變遷的時間序列中此項心理或行為係逐漸減弱。綜括而言，貫時性與同時性兩套資料所得的結果，皆顯示在台灣的

社會變遷中，大學生在Morris(1956)的人生觀因素A(社會約束與自我控制)與因素B(行動為樂與進步是尚)上有漸減的趨勢，在因素E(自我縱容與感官享樂)上則有漸增的趨勢。

雷霆與楊國樞(1984)所從事的一項有關研究，亦係同時採用貫時性與同時性兩種方法。他們以Allport, Vernon 及 Lindzey的價值研究(Study of Values)問卷與個人現代性量表施測大學生 905人，然後將前者所得的結果與李美枝、楊國樞(1973)二氏在1964年用價值研究問卷施測 195位大學生所得的結果相比較，發現1984年的大學生在審美價值與政治價值上得分高於1964年的大學生，而在理論價值、經濟價值及宗教價值上則得分低於1964年的大學生。以1984年的資料從事同時性的分析，發現個人現代性與審美價值成正相關，而與經濟價值、宗教價值二者成負相關。正如前述楊國樞與黃囁莉(1984)二氏的研究，貫時性研究的資料證實了同時性研究的資料。在此一研究中，個人現代性與社會價值的相關雖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在瞿海源(1971)較早所從事的一項研究中，二者則成顯著的負相關。

另一項探討個人現代化程度與價值觀念之關係的研究，為黃素菲(1985)所從事，她以481位大學生為受試者，用Buhler(1965)的生活目標調查表(Life Goal Inventory)(修訂量表)、詹益霖(1964)所修訂的貝氏適應量表(Bell Adjustment Scale)及個人現代性量表等為工具，探討生活目標及其相關因素。她所得的結果顯示：無論是男生或女生，個人現代性與「追求安全與逃避危險」、「遵守規範與約束自我」兩項基本生活目標的重要性成負相關，而與「培養情感與建立歸屬」、「獲取成功與擁有權勢」及「發揮能力與實現自己」三項基本生活目標的重要性則無顯著相關。

以上是有關價值變遷的貫時性與同時性研究結果。與價值取向及價值觀念密切關聯的是態度與態度叢結(attitudinal syndrome)。過去的研究中，亦有探討態度與態度叢結的變遷者，但大都屬於同時性的探討。例如，在瞿海源(1971)的研究中，個人現代性與權威態度(authoritarianism)成負相關。在其探討生育態度與行為之相關因素的研究中，楊國樞(Yang, 1976)亦發現個人現代性與權威態度成負相關。在政治學者(如陳義彥, 1977; 胡佛, 1977, 1982)以大學生與成年人所從事的有關研究中，也一再發現這兩個變項成顯著的負相關。

胡佛(1982)與梁雙蓮(1984)曾分別以成年人為對象，探討個人現代性

與數項民主態度的關係，發現個人現代性與平等權、多元權、自主權、制衡權及自由權五種民主態度皆成正相關。在以台北市 508 位公務員為對象所從事之有關組織認同的研究中，梁雙蓮(1984)並發現個人現代性與疏離感(sense of alienation)成正相關。在楊國樞(Yang, 1976)有關成人之生育態度與行為的研究中，發現個人現代性與內控態度(internal-control attitude)成正相關，即現代化程度較高者比較相信自己的技能、努力、先見及負責是決定個人得失、禍福、成敗或獎懲的主要因素。個人現代性較高者有較強之內控態度，亦可見之於楊國樞(1982b)有關「緣」或「緣份」的研究。在傳統中國人的概念中，緣是一種富有宿命色彩的獨特態度，所指的是一種前定的人際親和性。持有此種態度的中國人，相信幾乎每一種人際關係或聚會都是由命運、不可知的力量或前世的作為所決定。楊氏以 543 位大學生從事有關緣之態度與概念的研究，發現個人現代性較高者對緣的信念較弱。因為緣所代表的是一種外控態度(external-control attitude)，此一發現可以作以下的解釋：現代化程度較高者，外控態度較弱，而內控態度較強。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敘述了有關價值與態度變遷之貫時性與同時性的主要研究。從這些研究所得的結果看來，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台灣民衆在價值與態度方面已經產生以下的轉化：他們的價值系統從內修取向與集體取向(強調上下關係)變向實行取向(強調外在成就)與個人取向(強調個人自主性)。對於強調社會約束與自我控制的生活方式及強調行動為樂與進步是尚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喜歡程度有逐漸減低的趨勢；對於強調自我縱容與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喜歡程度則有逐漸增高的趨勢。隨着社會變遷，他們對美感經驗與權力影響的興趣日益增強，對理論思考、經濟價值、社會關愛及宗教經驗的興趣則日漸減弱。在基本生活目標方面，他們不但重視追求安全與逃避危險的程度逐漸減低，而且重視遵守規範與約束自我的程度也在變弱。此外，他們的權威態度與外控態度漸減，而民主態度、內控態度及疏離感受則漸增。

三、氣質特性的變遷

在性格心理學的文獻中，氣質是界定最不清楚的一類性格特質，常將其他各類性格特質(如性向、需求、價值、態度)所無法涵蓋者納入其中。根據 Buss 與 Plomin(1975)，Guilford(1959)，及 Thomas 與 Chess(1977)

的觀點，氣質既不同於性向性的特質（如性向、智力及能力），也不同於動機性的特質（如需求、價值及態度）。性向所涉及的是一個人能做什麼及能做多好，動機所涉及的是一個人為什麼要做或在做他所做的行為或事情。與此不同，氣質所涉及的則是一個人的反應方式或做事格調。換言之，氣質所關涉的是行為的方式（*style*）而非內容，所著重的是表現性或表達性的行為（*expressive behavior*），而非工具性或因應性的行為（*instrumental or coping behavior*）。

有關氣質變遷的實徵研究，過去已完成了不少，但却大多屬於同時性的探討。此等研究所採用的個人現代性量表，有的是最早的形式，有的則是修訂的形式。早期的有關研究之一為瞿海源（1971）所從事，他以個人現代性量表與中譯之毛德斯里性格測驗（*Maudsley Personality Inventory*）施測 209 位大學生，發現個人現代性與神經質（*neuroticism*）成負相關，與內外向（*introversion-extraversion*）則無統計上的顯著相關。在晚近的一項研究中，葉明華（1981）以 437 位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個人現代性與對生活壓力或刺激之忍受力的關係，發現二者有顯著的正相關。葉氏的研究有一特別有趣的發現，即個人現代性具有干涉變項（*moderator variable*）的作用，能夠改變生活壓力與壞習慣數兩者的關係：在現代性較低的大學生中，生活壓力與壞習慣數成正相關；在現代性較高的大學生，生活壓力與壞習慣數則無相關。

瞿、葉二氏的研究所探討的是有關情緒性與焦慮性的變遷。過去亦有研究探討另一類氣質特性的變遷，此即自制性與謹慎性。其中一項為黃光國與楊國樞（1972）所從事，內含數個實驗。研究者先以個人現代性量表施測約兩百位大學女生，從中選出得分最高者為高現代性組，最低者為低現代性組，然後邀至實驗室進行個別實驗。在其中一項實驗內，實驗者（男性）要求受試者（女性）坐在速示器（*tachistoscope*）前從事認詞作業，每詞在速示器中現露的時間有短至長，直到受試者認對該詞。實驗的結果顯示：在認知與性有關的各禁忌詞時，高現代性組的受試者認對所需的時間較低現代性組的受試者為短；在認知各中性詞時，兩組受試者認對所需的時間則相同。從這一實驗結果，可以推知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在社會情境下抑制自感不太適當之行為的傾向較小。在另一實驗中，每位受試者先以二十分鐘的時間做一件簡單、冗長而無聊的作業（將甲盒中的圍棋子一一拿入乙盒），然後評定自己對作業與實驗的感受。所得的結果顯示：與低現代性組相比，高現代性組對以下三方

面的評分都較低：(1)作為測量動作技巧的一種方法，所採用之實驗程序與作業的有用性，(2)此種實驗所得之結果與報告在科學上的重要性，(3)下次再來參加類似性質之實驗的意願程度。在第三項研究中，則發現高現代性者在就個人重要事情（如選課、選擇課外活動、選擇配偶、公開表明意見）做決定前徵詢他人意見的傾向較小。以上三項互相關聯的研究，皆顯示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青年其自制性與謹慎性較低。

楊國樞（1974）曾從事另一項有關的研究，所採用的工具是個人現代性與魯氏圖形挫折研究（Rosenzweig Picture Frustration Study）。他以個別的方式施測大學生 100 位，所得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挫折之外罰反應（*extrapunitive reaction*）與個人現代性成正相關，對挫折之內罰反應（*intrapunitive reaction*）與個人現代性成負相關。換言之，現代化程度較高者將挫折攻擊性的歸因於外在世界之人事物的傾向較大，將挫折攻擊性的歸因於自己（為免表露在外而加以抑制的結果）的傾向較小。再一項有關研究亦為楊國樞（Yang, 1981）所完成。在此研究中，楊氏自一較大樣本的大學生中選出 46 位在個人現代性量表上得分最高者與 46 位得分最低者，然後個別以羅氏墨跡測驗（Rorschach Ink-blot Test）施測之。研究者發現現代化程度較高者對十張墨跡圖片所做的反應總數較多，從眾反應（*popular response*）的數目則較少。同時，所得的結果也顯示：現代化程度較高者對每一圖片所做的第一個反應所需的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或潛伏時間（*latency time*）較短，此後所做的每個反應所需的平均時間也較短。從這些發現看來，現代化程度較高者其在社會情境下自我抑制與謹慎的傾向較弱。

有關個人現代性與氣質的關係，李本華（1973）的研究亦曾提供大量的資料，所包含的範圍不僅涉及有關情緒性、焦慮性、自制性及謹慎性的氣質特性，而且也涉及其類別的氣質特性。她以個人現代性量表分別與卡氏十六種性格因素問卷（Cattell's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基晉二氏氣質調查（Guilford-Zimmerman Temperament Survey）及高氏加州心理測驗（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相配，分別施測不同樣本的大學生（自 165 至 293，人數不等）。經過統計分析後，所得的結果提供了多項同時性或橫斷性的資料。在卡氏十六種性格因素問卷上，個人現代性與穩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支配性（*dominance*）、興奮性（*surgency*）、敢為性（*parmia*）及急進性（*radicalism*）五者成正相關。

，而與內律性 (superego strength)、憂慮性 (guilt proneness) 及自制性 (controlled will) 三者成負相關。在基督二氏氣質調查上，個人現代性與優越性 (ascendance)、男性化 (masculinity) 成正相關，而與抑制性 (restraint)、友善性 (friendliness) 及個人關係 (personal relation) 三者成負相關。在高氏加州心理測驗上，個人現代性與自在性 (social presence)、幸福感 (sense of well-being)、容忍性 (tolerance) 及伸縮性 (flexibility) 成正相關。

另一項採用高氏加州心理測驗的有關研究，為 Abbott (1970) 所從事。他比較台北市、美國舊金山兩地中國青少年及其父母在此測驗所測各性格變項上的差異，發現青少年在好印象 (good impression)、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 及女性化 (femininity) 三個性格變項上的得分低於他們的父母，在伸縮性與容忍性兩個性格變項上的得分則高於他們的父母。此等差異的可能解釋之一是：新的一代在他人心目中留下好印象、自我控制及女性化三種氣質特性上比上一代弱，在伸縮性與容忍性兩種氣質特性上比上一代高。這種代間差異可能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但此等差異亦可用年齡或個體發展的因素加以解釋。

總括以上有關氣質變遷的實徵研究，我們可以暫作以下的結論：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台灣民衆在社交性 (或外向性)、友配性 (或優越性)、穩定性、興奮性、敢為性、急進性、伸縮性、容忍性及男性化等各項氣質特徵上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在情緒性 (或憂慮性)、自制性 (或謹慎性)、友善性 (或和諧性)、內律性及女性化等各項氣質特徵上有逐漸減弱的趨勢。

四、心理健康的變遷

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歷程中，人們心理健康的程度是否會有所增減？對於這個問題，不同背景與立場的人，可能提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有些憂心忡忡的道德家與思想家 (如 Fromm, 1955 ; Slater, 1970)，常有人心不古、世道衰微之嘆，甚且指出現代社會與生活可能導致疏離感、無力感、孤立感及焦慮感的種種特徵。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比較樂觀的學者 (如 Inkeles & Smith, 1976 ; Lerner, 1958) 則認為現代化可以解決若干不利於人生的重大問題 (如疾病、貧窮、愚昧等)，從而提高了生活素質，增加了生活幸福。

在理論分析的層次，兩方面的說法都能言之成理，但在實徵分析的層次，研究成果却極為缺乏，實難據以作整個性的論斷。可以肯定的是，現代化所造成的社會變遷，有些方面是對生活適應有利的，有些方面則是對生活適應不利的。我們所關心的是，有利的效果與不利的效果兩相抵銷之後，淨的增益究竟如何。尤有進者，社會現代化雖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但其在各個地區或國家的型態並不相同，因而對民衆生活適應的影響也會互有差別。

此處，我們所想討論的是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對民衆生活適應的影響。生活適應的範圍頗大，以下將以心理適應或健康作為討論的重點，目的在瞭解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衆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改變。有關這一問題的探討，過去已有數項研究發表或完成，以下將分就貫時性研究與同時性研究加以說明，然後再從事綜合性的討論。

有關這一問題的貫時性研究，主要為精神醫學者與臨床心理學者所完成。台灣的精神科醫生曾先後從事三項大規模的有關研究，目的在探討社會變遷過程中各種心理或精神疾病罹患率（prevalence rate）的改變。第一項研究是由林宗義、林憲、葉英堃、徐澄清及朱桓銘（Lin et al., 1969）所從事，時在1946年到1948年間。他們在新埔、安平及木柵三個地區訪問調查19,931位居民。十五年後，在1961年到1963年間，他們又在相同地區以同樣方法舉辦第二次調查，訪問人數共為29,024。比較這兩次調查所得之各類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罹患率，林氏等發現兩項重要的結果：(1)在此十五年間，精神官能症（psychoneurosis）的罹患率有顯著的增加，(2)在此十五年間，精神病（psychosis）的罹患率大致未有增減。又過了二十餘年，葉英堃、胡海國、張笠雲等人（Yeh et al., 1985）於1982年至1983年間在台北市調查5,005位居民之各種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罹患率，隨後又於1984年在樹林鎮與竹東鎮調查3,004位居民之各種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罹患率。最近這兩次精神疾病的調查研究，所採用的方法與林宗義等人所採用者不同，係精神醫學界近年來所發展的診斷訪問量表（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的中文修訂量表。所得資料經分析比較後，發現以下的主要結果：(1)與林宗義等人在1961-1963年所得的結果相比，最近這兩次調查中精神官能症的罹患率增加9到11倍；(2)與林宗義等人在1946-1948年所得的結果相比，最近這兩次調查中酗酒（alcoholism）的罹患率增加140到180倍；(3)與林宗義等人二十年前所得的結果相比，最近這兩次調查中躁鬱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 的罹患率增加約 25 倍；(4)與林宗義等人二十年前所得的結果相比，最近這兩次調查中精神分裂病 (schizophrenia, 精神病的一種) 的罹患率大致無明顯的增減趨勢，亦即三十幾年來保持未變。葉英堃等人認為上述的差異 (特別是有關精神官能症罹患率的差異) 無法全以診斷方法上的不同來解釋，而是與社會變遷的影響有關。

事實上，其他有關研究所得的結果，也大致支持上述的結果。例如，台北市立療養院最近所發表的年度報告 (1980 - 1983) 中，清楚顯示該院之住院與門診病患中情感性精神病 (affective psychosis, 包含躁鬱性精神病) 的個案有顯著增加的趨勢。這一發現與上述第(3)項結果是一致的。再者，瞿海源 (1980) 根據台北市 1968 年至 1976 年之統計要覽中的資料分析各市立醫療機構門診病患的類別與人類，經就 132 種疾病加以比較後，發現有七種疾病的罹患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有兩種與心理健康狀況有關，此即精神官能症與消化性胃腸潰瘍病 (心因性者)。瞿氏的分析顯示，在此期間精神病與機能性胃腸潰瘍病 (非心因性者) 兩者的罹患率則無顯著變遷。

從以上所述之貫時性研究結果看來，社會變遷似乎不利於心理健康或適應，因為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精神分裂性精神病 (可能主要與遺傳因素有關) 的罹患率雖未增加，但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酗酒及心因性胃腸潰瘍病都皆有增加的趨勢。但是，文獻中也有部分貫時性研究所得的結果，顯示了不同的趨勢。例如，林憲 (1984; Rin, 1975) 根據中華民國衛生統計資料，分析三十年來台灣民衆自殺率的變遷，發現自殺率的變遷曲線呈倒U型態：自1948年到1964年，自殺呈漸增的趨勢，此後至1977年則呈漸減的趨勢。林氏認為最近十五年來自殺率之降低係與以下因素有關：(1)社會在面臨現代化之新價值標準的衝擊後，大家都能迅速取得相互的協調；(2)經濟發展使家庭生活更為安定，而且對人際衝突的解決提供更多的方法與資源；(3)經濟發展使教育更為普及，而教育的效果則使大眾的想法更趨理性，情緒的發展更趨穩定。另一項有關的研究為余德慧與張文雄 (1984) 所從事，他們分析1973年至1984年台中市某大學以柯氏心理健康問卷 (又稱柯氏性格量表) 施測大一新生所得的資料，發現如下的主要結果：(1)在過去十三年間，該校男生的疑心程度、畏縮程度、強迫性格及自我強度皆有顯著的線性 (linear) 下降趨勢，而其慮病程度、畏縮程度、悲觀程度、焦慮程度及敵意程度皆有顯著的正向二次曲線趨勢 (即下拋物線)，變遷方向係先降後增；性壓抑程度有顯著的線性上升趨勢，且僅有獨

立性程度呈顯著的負向二次曲線趨勢（即上拋物線），變遷方向係先增後降。(2) 在過去十三年間，該校女生的疑心程度、慮病程度、畏縮程度、悲觀程度、焦慮程度、強迫性格、性壓抑及敵意程度皆呈顯著的線性下降趨勢，而自我強度與獨立性程度則皆呈顯著的線性上升趨勢。大致而言，余德慧等人的研究似乎顯示社會變遷對男女兩性的心理健康都有比較有利的影響，雖然在最近兩、三年中男生的慮病程度、悲觀程度、焦慮程度及敵意程度有回升的趨勢。不過，自 1978 年以後之樣本組成有嚴重的缺失，在 1978 - 1981 各年次甚至有半數以上的學系未曾施測。因此，上述結果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應予存疑。

除了貫時性的有關研究外，過去亦有學者以同時性的方法探討社會變遷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此等研究中，柯永河（Ko, 1975 a, 1975 b）曾以居住城市的大小為橫斷變項，用以代表不同程度的都市化或工業化，進而探討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其第一項研究（Ko, 1975 a）中，他是使用柯氏心理健康問卷在彰化市施測中學生 407 人，在台北市施測中學生 834 人。比較大小兩個城市的青少年在各個量表上得分的差異，發現台北市的受試者疑心程度、悲觀程度、焦慮程度及敵意程度皆較高，而其獨立性程度則較低。亦即，台北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如彰化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柯氏（Ko, 1975 b）的另一項研究是以同樣的工具與方法比較台北市的高中學生 479 人與宜蘭市的高中學生 538 人，發現台北市女生的心理健康較宜蘭市女生為差（如抑鬱程度、敵意程度較高），而兩市男生的心理健康則互有短長。柯氏認為以上兩項研究中所發現的差異是代表都市化或工業化程度不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惟在此兩項研究中，在比較台北市與彰化市或宜蘭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差異時，並未控制都市化或工業化程度以外的任何其他因素（如升學壓力與社經地位），混淆因素（confounding factor）太多，實難貿然據以論斷都市化或工業化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其他有關研究所採取的橫斷變項皆為個人現代化程度。這一類的研究大都利用相關法探討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變項的關係，藉以推論社會變遷過程中心理健康的變遷。在上文有關氣質特徵變遷的討論中，我們曾述及數項涉及心理健康的發現：(1) 瞿海源（1971）發現個人現代性與神經質（neuroticism）成負相關；(2) 葉明華（1981）發現較高的個人現代性似能使人經歷較多生活壓力而不致形成較多不良習慣；(3) 李本華（1973）發現個人現代性與興奮性、穩

定性、自在性、幸福感、容忍性、伸縮性等成正相關，與憂慮性、友善性等成負相關。此等結果大致暗示：個人現代性較大者，其心理健康較佳。

最近的進一步研究，也大致獲得類似的結果。例如，姚德慈(1984)以個

表一 個人傳統性、個人現代性與身心適應變項的相關係數 (r)
(n = 414)

	1 身 體 化 症 狀	2 強 迫 性 行 為	3 人 際 敏 感 反 應	4 抑 鬱 反 應	5 焦 慮 反 應	6 敵 意 行 為	7 恐 懼 性 焦 慮	8 妄 想 意 識	9 精 神 病 傾 向	10 症 狀 總 數	11 症 狀 嚴 重 性 指 標	12 症 狀 困 擾 度 指 標
個人傳統性	.20***	.24***	.21***	.21***	.23***	.18**	.24***	.23***	.24***	.29***	.26***	.09
個人現代性	-.10*	-.13**	-.11**	-.07	-.06	-.05	-.17***	-.07	-.03	-.14**	-.10*	-.02

*P < .05 , 雙測檢定。

**P < .01 , 雙測檢定。

***P < .001 , 雙測檢定。

人現代性量表、身心適應問題量表及自編的認知衝突問卷，施測 414 位在學與就業的女性知識青年，然後分析現代性觀念與傳統性觀念間的認知衝突及其與身心適應的關係。她以自製的傳統性指標與現代性指標探討兩者與身心適應的關係，獲得以下的結果：現代性對身心適應的影響並不明顯，影響較大者為傳統性——傳統性較高者，其身心適應較差。利用姚氏所蒐集的原始資料，將個人現代性量表中的題目分為現代性題目與傳統性題目，並分別予以計分，則可獲得個人現代性與個人傳統性兩項分數。以這兩項分數分別與各個身心適應變項求相關，得到表一所示的結果。從表中的相關係數可知，個人現代性與身心適應或不健康的各個變項都成負相關，只在身體化 (somatization) 症狀、強迫性行為、人際敏感反應、恐懼性焦慮、症狀總數及症狀嚴重性指標等變項上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個人傳統性與身心適應或不健康的各個變項都成正相關，且相關

係數的絕對值都較高，幾乎都達到高度的統計顯著水準。總括而言，個人現代性愈高者其身心適應或健康愈好，個人傳統性愈高者其身心適應或健康愈差，雖然前項關係不及後者之明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個人現代性會逐漸增高，個人傳統性則會逐漸減低，由此應可推論身心適應或健康會逐漸改善。

另一項有關研究為黃素菲（1985）所完成。在其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除了探討生活目標及其相關因素外，她會順便分析個人現代性與生活適應的關係。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家庭適應、健康適應、社會適應及情緒適應四者中，個人現代性僅與社會適應成顯著的負相關（男、女兩樣本皆然），即現代性較高者社會適應較差。此外，楊國樞（1984）亦曾探討個人現代性與組織適應的關係。他以2,152位公營企業的員工為對象，分就工作環境知覺、工作滿足及工作士氣三方面，比較現代性員工與傳統性員工（以個人現代性量表得分高低區分）的差異。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與傳統性員工相比，現代性員工對工作環境有較多的良好知覺及較少的不良知覺，在工作滿足上有較強的滿意及較弱的不滿，在工作士氣上有較多的良好反應及較少的不良反應。亦即，現代性員工的工作環境知覺、工作滿足及工作士氣皆較傳統性員工為好。簡言之，現代性員工的組織適應較傳統性員工為佳。

以上我們就貫時性探討與同時性探討，陳述了有關社會變遷中心理健康轉變的研究結果。在貫時性的探討中，林宗義等（Lin et al., 1969）、葉英堃等（Yeh et al., 1985）及瞿海源（1980）的研究顯示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精神或心理疾病（如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官能症及酗酒）與心因性胃腸潰瘍病有增加的趨勢，但林憲（1984；Rin, 1975）的研究則發現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自殺率有先增後減的趨勢。余德慧與張文雄（1984）的研究，因受樣本缺失的限制，所得結果缺乏內在效度。整體而言，從現有之貫時性研究的成果來看，台灣地區的社會變遷似有助長心理病態及心因性身體病態的傾向。

在同時性或橫斷性的探討中，村永河（Ko, 1975a, 1975b）的研究受限於混淆因素的不利影響，所得的結果內在效度可疑，自不能據以論斷心理健康的變遷。瞿海源（1971）、葉明華（1981）、李本華（1973）、姚德慈（1984）、黃素菲（1985）及楊國樞（1984）的研究則顯示：個人現代性較高（或傳統性較低）者，其神經質、憂慮性、身體化症狀、強迫性行爲、人際敏感反應、抑鬱反應、焦慮反應、敵意行爲、恐懼性焦慮、妄想意識、精神病傾向（psychoticism）較低及社會適應較差，其生活壓力忍耐力、穩定性、自在性、幸福

感較高及工作環境知覺、工作滿足、工作士氣較好。除個人現代性較高者社會適應較差一項外，其他各項關係皆表示個人現代性愈高者心理健康愈好。有關社會適應的「反常」發現，應該在此略加說明。首先必須指出，在黃素菲（1985）的研究中，個人現代性與社會適應的負相關雖然皆具起碼的統計顯著性，但在男、女兩樣本中相關係數的絕對值皆甚低（皆為 -0.15 ），表示其間之線性關係頗為微弱。其次應該指出，類似黃氏的研究發現亦曾見之於其他研究。例如，瞿海源（1971）發現個人現代性與社會價值（或興趣）成負相關，李本華（1973）發現個人現代性與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成負相關。黃、瞿、李等人的研究結果似乎都顯示同一傾向：個人現代性較高者，其社會性的興趣較低，人際適應的行為較弱。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內，人們特別強調社會團體（如家族）的團結與人際關係的維護，其社會興趣與社會適應自應最為突出；但在當前台灣的初級工商社會中，自我價值益受重視，個人競爭逐漸增強，社會興趣與人際適應自會相應衰退。個人現代性之所以與社會價值、個人關係、社會適應皆成負相關，可能這就是主要的原因。

總之，貫時性的研究大都發現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衆的心理或精神病態罹患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橫斷性的研究則大都發現個人現代性愈高者其心理或精神健康的程度愈大。在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民衆的個人現代性會愈來愈高，因個人現代性愈高者心理健康的程度愈大，故可推論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衆的心理健康會愈來愈能有所增進。這一推論結果似乎與貫時性研究所得的結果（即精神病態罹患率漸增）互相矛盾。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使瞿海源（1980）認為其間必有問題。經過分析後，瞿氏認為毛病是出在研究現代性的學者不應因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成正相關，即推論社會現代化或現代化的社會變遷對個人心理適應有益。他認為這是犯了與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相反的個人謬誤（individual fallacy）。這種說法只能告訴我們：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可以有不同的結果（包括看似矛盾的結果），但却未能告訴我們何以會有這樣的特定結果。因此，這樣的說法並未增加我們對問題的瞭解。

事實上，上述看似矛盾的結果是否涉及個人謬誤實在大成問題。瞿氏的基本出發點是將心理疾病罹患率視為社會層面的指標，將心理健康程度視為個人層面的指標。實則兩者並無這樣的基本差異。心理疾病罹患率雖是一個代表一群人的單一數值，但它却是一個平均數值，是將很多個人的反應（有無病態，為

以 0 與 1 爲代表的二元變項) 平均而得。因此，基本上心理疾病罹患率是一種以個人爲單位所獲得的平均值，它所代表的是一種「平均人」的反應。同樣的，心理健康程度也是如此。在有關個人現代性的研究中，爲了方便起見，常以相關法探討個人現代性與其他變項的關係（包括心理健康的變項或指標）。這看來好像是一種以個人爲單位的分析，應該是屬於個人層面的探討。實則，我們也可以不用相關法，而改以組別比較法。採用後一方法時，可將全體受試者依其個人現代性的得分分爲兩組或多組，然後計算各組在心理健康變項上的平均數，並比較其大小或差異。就資料分析的形式而言，組別間的同時性比較與年代間的貫時性比較並無不同。在這兩類比較中，心理疾病罹患率與心理健康程度都是代表一組人的平均數。它們都是以個人資料爲基礎，而且都代表一種平均而標準的個人。它們都不能代表社會或團體之真正的整體性特徵（如國家之土地面積、人口數目等）。總之，心理疾病罹患率與心理健康程度是屬於同一層面的資料，我們不能說前者是社會層面的指標，後者是個人層面的指標，進而將貫時性研究與同時性研究所獲得的「矛盾」結果歸諸個人謬誤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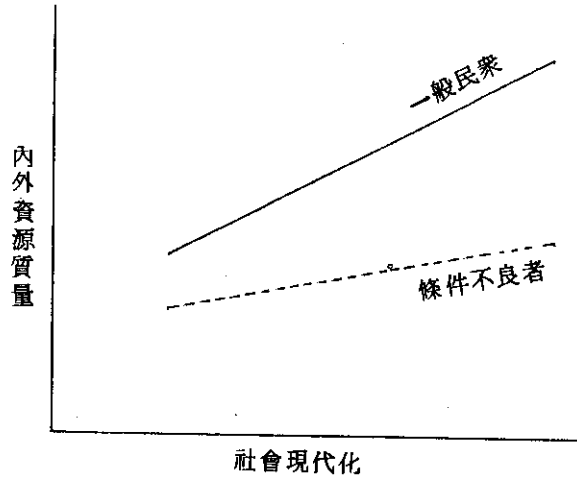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不同年代間之心理疾病罹患率的比較與不同現代性組別間之心理健康程度的比較，主要差異不在前者是屬於社會層面的分析，而後者是屬於個人層面的分析。主要差異在前者是貫時性分析，而後者是同時性分析。從個人層面的分析結果推論社會層面的現象是一會事，從同時性分析結果推論貫時性現象則是另一回事。根據楊國樞、黃曬莉（1984）及雷霆、楊國樞（1984）的研究與分析，從個人現代性與心理或行爲變項的關係，可以推論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該心理或行爲變遷的方向。大體而言，如果個人現代性與某心理或行爲變項成正相關，則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該心理或行爲會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果個人現代性與某心理或行爲變項成負相關，則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該心理或行爲會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個人現代性與心理或行爲變項的橫斷關係，推論不同年代間在該心理或行爲上的縱貫差異方向。換言之，就心理或行爲的範疇而言，橫斷性的發現具有據以推論縱貫性趨勢的關係效度（relational validity）。心理健康的變項都是心理或行爲變項，因而從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變項的關係來推論現代化社會變遷過程中心理健康的變遷方向，應當具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效度，至少不致觸犯明顯的經驗性謬誤。

從有關的同時性研究結果看來，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的指標大都成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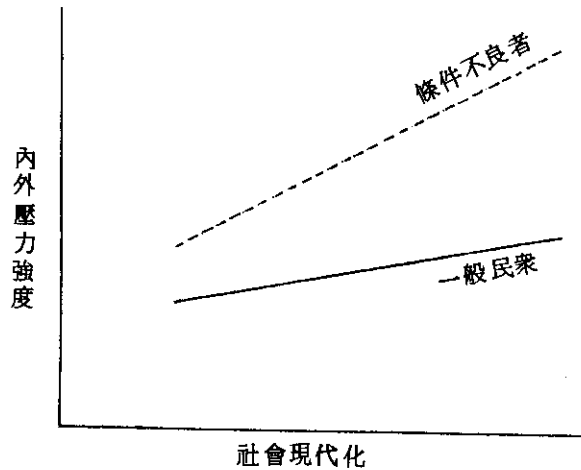
關，與心理不健康的指標大都成負相關。根據從橫斷發現推論縱貫趨勢的原則，我們可以推論在台灣的社會變遷中人們的心理健康有逐漸增進的趨勢。但另一方面，貫時性研究結果則顯示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衆的心理疾病罹患率有逐漸增高的趨勢。這兩組結果看似矛盾，實則不然。按心理健康程度與心理疾病罹患率是兩種性質相當不同的指標。心理健康程度是一種量的特徵，是人人都有的；心理疾病的罹患是一種質的特徵，不是人人都有的。心理疾病是心理健康程度最低的一端。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由於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生活條件之巨幅改善，及物質的、福利的、社會的、知能的生活資源之大量的增加，社會上大多數民衆的幸福與心理健康都會顯著升高，因而全體民衆心理健康的平均程度也會增大。但是，社會變遷也可能有其負面的影響，這包含變遷本身與新社會中若干不利於個人適應的因素（如激烈的競爭、細密的評價、人際的孤立）。對大多數民衆而言，這些不利因素也許不致構成問題，但對能力、知識及壓力忍受力偏低的人，則易於導致嚴重後果。對後一類人來說，由於個人特質與社經因素的限制，他們得力於現代化社會變遷者少，受制於現代化社會變遷者多，兩相配合之下，反而易於罹患心理疾病。影響所及，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可能有較大比率的人會罹患心理疾病。總而言之，隨着社會的現代化，大多數民衆的心理健康雖會逐漸升高，但部分民衆罹患心理疾病的機會却會加大，結果是心理健康平均程度與心理疾病罹患率會同時俱增。由此觀之，貫時性研究所發現之心理疾病罹患率漸增，與同時性研究所推論之心理健康程度漸升，兩者間未必互相矛盾。

上述分析的背後隱含着一套基本的看法：社會中有兩類民衆，一類是內外條件不良（能力、知識及壓力忍受力特低或個人際遇特壞的人），一類是其他的一般民衆（佔絕大多數），而這兩類民衆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中所經歷的情形也頗不相同。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兩類民衆所可能運用的內在資源（知識、技能及動機等）與外在資源（如金錢、資訊及工具等）都會逐漸增加，但條件不良者增加的速率顯著的小於一般民衆（如圖一）。同時，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兩類民衆所可能承受的內外壓力（見Holmes & Rahe，1967；葉明華，1981）都會逐漸增加，但條件不良者增加的速率顯著的大於一般民衆（如圖二）。個人心理健康的程度是個人生活適應的成果，而個人生活適應的程度是內外資源的正函數，同時也是內外壓力的負函數，其高低視後兩者的相互消長而定。就條件不良者而言，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內外資源的增加速

率較小，而內外壓力的增加速率較大，前者愈來愈無法因應後者，其個人生活適應的水準自會逐漸下降，個人心理健康的程度也將隨而減低。反之，就一般民衆而言，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內外資源的增加速率較大，而內外壓力的增加速率較小，前者愈來愈能因應後者而有餘，其個人生活適應的水準自會逐漸上升，個人心理健康的程度也將隨而增高（如圖三）。如將一般民衆（人數特多）與條件不良者（人數頗少）合併為全體民衆，則其平均心理健康程度將呈逐漸增高的趨勢。由以上的分析看來，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心理疾病罹患率（主要來自條件不良者）逐漸升高與一般民衆心理健康程度逐漸增進，兩者間並不見得互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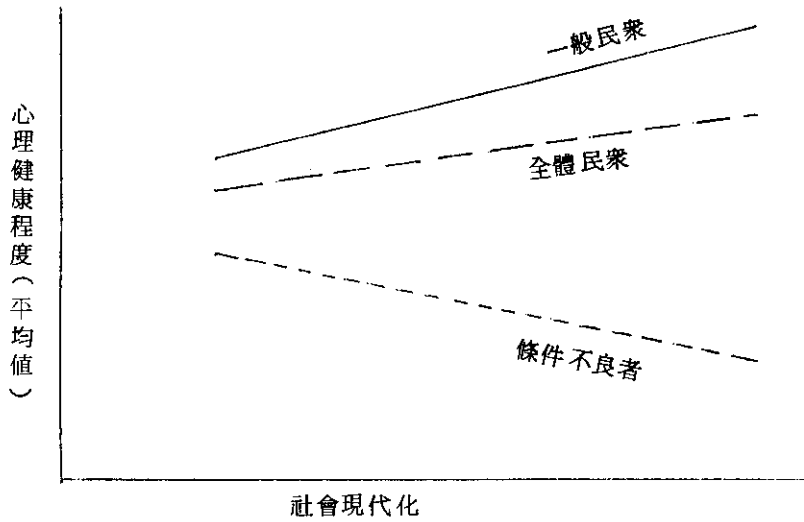
圖一 社會現代化與內外資源的關係（示意圖）



圖二 社會現代化與內外壓力的關係（示意圖）

五、綜合性的結論

到此為止，我們已根據貫時性與同時性的實徵研究結果，分就動機與需求的變遷、價值與態度的變遷、氣質特性的變遷及心理健康的變遷四方面，陳述了台灣民衆在社會變遷中心理與行為的蛻變情形。為簡明起見，特將這四方面



圖三 社會現代化與心理健康程度的關係 (示意圖)

之蛻變的主要內容臚列如下：

逐漸減弱者

逐漸增強者

動機與需求方面的特徵

順服需要

表露需要

謙卑需要

自主需要

秩序需要

內省需要

撫助需要

異性戀需要

持久需要

成就需要 (個人取向的)

成就需要 (社會取向的)

社會贊許需要

價值與態度方面的特徵

對內修之偏好

對成就 (活動) 之偏好

對集體取向人際關係之偏好

對個體取向人際關係之偏好

對社會約束與自我控制之偏好

對自我縱容與感官享樂之偏好

對遵守規範與約束自我之偏好

審美價值

對追求安全與逃避危險之偏好	內控信念
理論價值	民主態度
社會價值	疏離感受
宗教價值	
外控信念	
權威態度	

氣質特性方面的特徵

自制性與謹慎性	社交性與外向性
友善性與和諧性	支配性與優越性
內律性	穩定性
憂慮性	興奮性
女性化	敢為性
	急進性
	伸縮性
	容忍性
	男性化

心理健康方面的特徵

神經質	精神官能症
身體化症狀	情感性精神病
強迫性行爲	酗酒
人際敏感反應	心因性胃腸潰瘍病
抑鬱反應	壓力忍受力
焦慮反應	穩定性
敵意行爲	自在性
恐懼性焦慮	幸福感
妄想意識	組織適應
精神病傾向	
社會適應	

台灣地區民衆之心理與性格的上述各項變遷，既不完備也非確定。這些心理與性格的蛻變，只是反映過去有關研究的部份結果，將來隨着新的研究發現，勢須不斷修正其內涵。實徵研究所發現的上述蛻變，其內涵雖屬粗略，但是我們仍可從中歸納出台灣地區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性格變遷的大致方向。就動機與需求、價值與態度、氣質特性三大方面而言，各項逐漸減弱的特徵可以歸納成以下主要心理與性格向度：集體主義取向、他人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順服傾向、壓抑傾向及女性化傾向；各項逐漸增強的特徵可以歸納成以下主要心理與性格向度：個體主義取向、自我取向、競爭取向、平權取向、自主傾向、表現傾向及男性化傾向。前一套心理與性格向度可用楊國樞（1981 a，1981 b，1982）之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的概念加以總括，後一套心理與性格向度可用個我取向（individual orientation）的概念加以總括。社會取向的性格是適應農業社會之所需，個人取向的性格則為適應工商社會之所需。以上所列各項逐漸減弱的特徵，顯示在現代化過程中台灣民衆社會取向的性格漸弱；所列各項逐漸增強的特徵，則顯示在現代化過程中台灣民衆個我取向的性格漸強。大體而言，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台灣民衆之性格與行為的基本蛻變方向是從社會取向到個我取向。這種性格蛻化與價值變遷的方向，對台灣民衆適應其工商業化中的新社會是很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 文崇一 (1979) 地區間的價值差異。見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
- 李本華 (1973) 個人現代化程度的相關人格特質。中華心理學刊，15，46-53。
- 余德慧、張文雄 (1984) 台灣大學生心理健康的變遷分析。「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宣讀之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 李美枝、楊國樞 (1973) 中國大學生的價值觀。見李亦園、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林憲 (1984) 台灣的自殺現象與問題。見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胡佛 (1977) 性格特質與政治價值取向。未發表之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 胡佛 (1982) 有權與無權：政治價值取向的探討。見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姚德慈 (1984) 女性之現代與傳統間的認知衝突與身心適應。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梁雙蓮 (1984) 中央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組織認同的研究。未發表之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陳義彥 (1977) 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未發表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黃光國、楊國樞 (1972) 個人現代化程度與社會取向強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2，245-278。
- 黃素菲 (1985) 生活目標及其相關因素：實徵性的研究。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葉明華 (1981) 生活壓力、自我強度與現代性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雷霆、楊國樞 (1984) 大學生價值觀的變遷：二十年後。「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宣讀之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 楊國樞 (1972) 中國大學生的人生觀。見李亦園、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 (1974) 個人現代性與挫折反應。未發表之研究結果，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楊國樞 (1981) 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爲：形成及蛻變。中華心理學刊，23，39-55。
- 楊國樞 (1982a) 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見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 (1982b) 緣及其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

- 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研討會編文集。台北：中華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
- 楊國樞 (1984) 現代性員工與傳統性員工的環境知覺、工作滿足及工作士氣。見楊國樞、黃光國、莊仲仁主編：中國式管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 楊國樞、黃囁莉 (1984) 大學生人生觀的變遷：二十年後。「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宣讀之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 楊國樞、張分磊 (1982) 價值取向及其變遷：以大學生的研究為例。「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研討會」宣讀之論文，中國時報主辦。
- 楊國樞、瞿海源 (1974) 中國人的現代化：有關個人現代性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7,1-38。
- 瞿海源 (1971) 現人現代化程度與人格之關係。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瞿海源 (1980) 論幾個與社會變遷有關的心理指標。見第一屆社會指標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瞿海源、楊國樞 (1972) 中國大學生現代化程度與心理需要的關係。見李亦園、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詹益霆 (1964) 貝爾適應量表之研究。測驗年刊，11,39-59。
- 劉君業、陳竹華、陳月喜、楊國樞 (1973) 台大學生在做些什麼？思與言，10(5)，6-29；10(6)，1-19。
- Abbott, K.A. (1970) Harmony and individualism : Chang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Taipei and San Francisco. Taipei : Asian Folklore and Social Life Monographs.
- Buhler, C. (1965) Life goal inventory manua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65.
- Buss, A.H. and Plomin, R. (1975) A temperament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 Wiley.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83)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 CEPD.
- Fromm, E. (1955)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 Rinehart.
- Guilford, J. P. (1959) Personality. New York : McGraw-Hill.
- Holmes, T. H. and Rahe, R. 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218.
- Hwang, C.H. (1976)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needs over thirteen year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aipei), 9, 85-94.
- Inkeles, A. and Smith, D.H. (1976) Personal adjust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C.A. DeVos (ed.), Response to change. New York : van Nostrand.

- Kluckhohn, F. R. and Strodtbeck, F. L. (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Evanston, ILL. : Row, Peterson.
- Ko, Y.H. (1975a) Influence of urban life on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Bulletin (Taipei), 19,16-22.
- Ko, Y.H. (1975b) Stud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two differently industrialized cities. Acta Psychologica Taiwanica, 17,25-38.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 Free Press.
- Lin, T.Y., Rin, H., Yeh, E.K., Hsu, C.C., and Chu, H.M. (1969)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fifteen years later. In W. Caudill and T. Lin (eds.),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onolulu : East- West Center.
- Morris, C. (1956) Varieties of human valu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n, H. (1975) Suicide in Taiwan. In N.L. Farberow(ed.), Suicide in different cultures. Baltimore : University Park Press.
- Slater, P. (1970)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Boston : Beacon.
- Thomas, A. and Chess, S. (1977) Tempera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 Bruner , Mazel.
- Yang, K.S. (1976)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family size, son preference, and birth control in Taiwan. Acta Psychologica Taiwanica, 18, 67-94.
- Yang, K. S. (1981)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159-170.
- Yang, K. S. and Liang, W.H. (1973) Some correlate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boys. Acta Psychologica Taiwanica , 15,59-67.
- Yeh, E.K., Hwu, H.G., Chang, L.Y., and Yeh, Y.L. (1985) Life-tim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and two townshi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Taipei, Taiwan.